

● 中国历史

史林耆英 师道楷模

——李涵先生的治学和育人

杨 果¹, 张星久²

(1. 武汉大学 人文科学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2. 武汉大学 政治与行政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杨 果 (1954-), 女, 湖南长沙人, 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历史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宋史研究; 张星久 (1956-), 男, 山东成武人, 武汉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政治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

摘 要] 宋辽金元史专家李涵师承于陈寅恪、聂崇岐、翁独健等史学巨擘, 在近半个世纪的治史生涯中潜心学问, 严谨创新, 对宋辽金元史研究作出了积极贡献, 其代表作《蒙古前期的断事官、必闾赤、中书省和燕京行省》等见解独到、考论严密、分析深刻, 被公认为蒙古国家中央官制研究的经典之作。她的研究善于贯通比较, 由此及彼, 从而得出超越一时一事局限的科学结论; 善于以小见大, 从对具体问题的分析折射大的社会场景, 具有鲜明的特色。与此同时, 李涵先生把教书育人视为更重要的事业, 她不仅重视对学生治史基本功的培养, 而且善于采用多种方法开启学生的悟性, 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作用; 尤其强调创新、求实、严谨的学风, 以自身的表率加以引导、教育, 把学术规范的训练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

[关键词] 李涵; 治学; 育人

[中图分类号] K24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374(2002)02-0180-08

一、蹉跎岁月

李涵先生 (1922-), 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 国内著名的宋辽金元史专家, 中国宋史研究会前理事, 中国蒙古史研究会前理事。原名缪希相, 祖籍江苏江阴, 1922 年旧历正月生于北京, 青少年时代先后就读于北京女一中、贝满女中、四川自贡蜀光中学和燕京大学^[1](第 192-193 页)。自燕京大学始, 李先生便选择了历史学作为自己的终生追求, 在陈寅恪、聂崇岐、翁独健等先生的指导下学习, 她修习了聂先生开设的历代官制史课程, 在聂先生亲自指导下写作本科毕业论文, 并在翁先生讲授的蒙古史课堂上, 第一次接触到神奇的蒙古国历史, 由此萌发出对宋史、辽金蒙元史研究的浓厚兴趣。李先生后来的学术方向和治学方法, 就奠基于此一时期。

也是在燕大读书期间, 追求进步的李先生积极投身于学生民主运动, 1948 年 9 月进入华北解放区, 在正定华北大学学习, 为防止国民党政府对留在“国统区”的家人的迫害, 她改名换姓, 从此以“李涵”一名行之于世。

新中国建立后,李涵先生服从组织安排,先是进入文化部,担任文物局秘书科科长、业务秘书等职,做业务管理工作;后调到武汉大学,从事历史学教学与研究,才算最终实现了自己的夙愿。

武汉大学历史系的李剑农先生,是李涵最早的工作导师。李剑农先生在认真阅读了李涵的大学毕业论文后十分赞赏,欣然决定让李师^①做他的科研助手,准备整理《宋会要》。另一位前辈学者唐长孺先生也很欣赏李涵的学术资质,加上对辽金元史有共同兴趣,因而常与李涵一起纵论民族史话,李涵的《蒙古前期的断事官、必闾赤、中书省和燕京行省》一文即是在唐先生鼓励下写作的,文章完稿后,唐先生力邀李涵把该文放在他当时任主编的《武汉大学学报》上发表。这篇文章,也就成为李涵研究蒙元史最早的作品。可惜,好景不长,接踵而来的先是李剑农老先生因眼疾失明,继之是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政治运动,不仅《宋会要》的整理工作被迫搁浅,民族问题的研究几成禁区,其他教学、研究工作也都受到严重干扰,李涵的一些研究论著亦或多或少地受到极“左”风气的影响,打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

“文革”10年,本应是李涵学术上积累日深、最可出成果的时期,她却和其他教师一样,被发配到“五·七干校”,远离书本,终日劳作,心头充满了怅惘与无奈,聊以自慰的是丈夫能平安地活着,女儿在一天天长天。

“文革”结束后,随着科学春天的到来,历史学也进入到最好的发展时期,李涵先生以空前的热情投身于教学与研究。她为武大历史系本科生开设宋元明清通史课、宋辽金元史专题课,招收宋元史方向研究生,撰写了《范仲淹传》、《金元之际汉地七万户》、《金初汉地枢密院试析》、《也论郝经》等一批学术论著,奠定了其在宋史、辽金元史研究领域的学术地位。

1989年夏,李涵先生从教学第一线离休,年近68岁。

离休后,李涵先生一方面继续学术研究,同时整理旧作,撰写回忆性文稿;另一方面,一如既往地在学习、生活上指导与关心自己的学生,甚至扩展到学生的学生。

离休的李涵先生,仍然活跃在教学、科研的领域。

二、学问人生

李涵先生的学术研究,集中在两大方面,一是宋史研究,二是辽金蒙元史研究。宋史方面,除了继续早年所从事的范仲淹研究之外,主要从事北宋政治制度研究,从职官设置、政治人物、政治事件等多个角度入手,探讨北宋政治制度的变迁,重点探讨北宋加强君主专制集权以来所表现出的君权与相权的矛盾、冲突及其影响。辽金蒙元史方面,集中探讨政治制度与民族关系。相比之下,李师最关心的问题还是少数民族的政治制度变迁及其与汉民族的关系。李师认为,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经历了许多民族长期杂居、互相融合的过程,辽、金、元是其中重要阶段。当契丹、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时,既要保持原有的旧俗,又不能不适应汉族较先进的社会新形势,他们的政治制度因之逐渐变化。一方面,他们在本民族原有习俗基础上建立了早期中央机构,另一方面,他们对所征服的汉地采用汉法,建立起另一套行政系统,并随着统治重心南移到汉族地区,其中央政府也随之改革为汉官制度,本民族旧制与汉制并存的“双轨制”终为以汉制为主的“单轨制”所取代。李师感兴趣的问题是,在这种带有规律性的变迁中,作为统治民族的女真、蒙古族是如何与当地的汉族(这里的汉族是广义的,包括已经汉化的其他少数民族)武装合作,如何依靠汉族文士为之出谋划策,进行统治的。李师的论文大都围绕这些问题展开。

李师治学最主要特点,亦即主要的学术贡献,可概括为两个字:创新。李师发表论著不以数量为意,而是追求高质量。这种高质量,首先表现为但凡下笔必要有自己的心得,或发前人之所未发,或对前人的研究加以深化,决不蹈袭前人。从研究选题到论证过程,李师往往能够另辟蹊径,从某些不为他人重视的独特角度切入,选择一些看似平常的资料,通过由表及里、逻辑严密、抽丝剥茧般层层深入的论证,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从早期的论文《蒙古前期的断事官、必闾赤、中书省和燕京行省》,到晚年的著作《范仲淹传》以及《试论宋朝的检正与都司》、《论章献刘皇后擅政与寇准之死》等诸篇论文,无一不是如此。

《蒙古前期的断事官、必闾赤、中书省和燕京行省》是李师较早的一篇论文,发表于 1963 年。该文选择蒙古早期的几个重要职官(机构),探讨蒙古国家为统治汉地而在机构上发生了哪些变化。文章对断事官、必闾赤的源流、变迁、地位和作用做了深入探讨,指出蒙古国早期中央政务机构的首脑是大断事官(蒙语称“札鲁忽赤”),主要由汉族或汉化的契丹、女真等族知识分子担任的必闾赤(即中书省)是协助大断事官处理国家事务的班子,它们共同构成了蒙古帝国的中枢机构,在促进蒙古统治者接受汉文化、蒙古国家走向大一统方面发挥了作用。李师指出,蒙古国早期的中书省与后来元朝中央集权制下的中书省性质完全不同,并澄清了中央大断事官和三行省大断事官的区别和联系,并提出了札鲁忽赤不属于怯薛执事官系统等独特的见解^[2](第 163 页)。这篇文章以其见解独到、考论严密、分析深刻而被公认为蒙古国家中央官制研究的经典之作,为后来的研究者经常引用,并在 20 世纪 80 年代国内的蒙元史研究重新恢复后,被收入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精选的第一部《元史论集》。

围绕辽金元时期的政治制度与民族关系问题,李师还撰写了《金初汉地枢密院试析》《金元之际汉地七万户》《也论郝经》以及辽金的奚族等一系列文章。《金初汉地枢密院试析》旨在探讨女真军队进入汉地以后至金熙宗全面改革中央官制前,金朝建立的汉地统治机构枢密院发生了哪些变化,为什么变化,以及枢密院的作用^[3](第 180 页);《金元之际汉地七万户》探讨蒙古统治者与汉族地主武装结合的过程,揭示了汉人世侯产生的原因、条件及其在帮助蒙古贵族治理汉地中所起的作用^[4](第 123-150 页)。虽然对于因资料缺乏而一直未能落实的最后一个万户究竟是不是李璿的问题,学术界有不同意见,李师自己也认为可以继续探讨,但文章从七万户入手解剖蒙古政治变迁与蒙汉民族关系,其新颖的视角、开创性的工作得到学术界的公认。《也论郝经》一文聚焦郝经,之所以如此,是认为郝经代表了少数民族政权中的汉族地主知识分子,包括汉化的契丹、女真知识分子。郝经对蒙古政权以及他出身的民族认同,不是依据种族,而是依据文化,他所提出的“能用土而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的思想,在中州士大夫中很有代表性,对于加深对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史的认识很有意义。正是有了像郝经以及元好问、耶律楚材等这样一批各民族出身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广泛支持,忽必烈才能成为元王朝的大一统皇帝^[5](第 184 页)。奚族是古代北方重要民族之一,活跃于唐、五代,契丹耶律阿保机兴起后,逐步征服奚族各部,分设若干节度进行统治;入金以后,完颜阿骨打设置都统司、处置司统领奚人,并将之分徙各地;元代以后,在历史舞台上活动近千年的奚族已不见踪影。李师注意到,对于这样一个重要的民族,以往的研究多局限于某个时期、某些问题的论述,而对于奚族的来源与发展,特别是在辽、金两代,奚族如何通过民族迁徙与杂居,导致其原有氏族部落组织逐渐破坏的历程,以及奚族与契丹、女真、汉族等如何互相影响、逐步融合等重要问题,研究很不充分。李师遂以《略论奚族在辽代的发展》^[6](第 277-294 页)和《金代奚族的演变》^[7](第 60-67 页)二文,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深入探讨,作出了令人信服的阐释。

宋代的相权是学术界十分关注的一个问题,李师对此亦饶有兴趣,与他人不同的是,李师的研究并不重复宰执制度本身,而是或对宰亲属官加以诠释,或从相关人物侧面切入,发人所未发。例如,1987 年写的《试论宋朝的检正与都司》一文,即是对以往不为人重视的宰亲属官检正官和尚书左右司进行细致的研究,旨在通过宰亲属官的变化看相权的扩大。研究认为,熙宁三年(1070 年)设置中书检正官,一律以朝官充当,提高了对其资历的要求,同时又提高了对检正的礼遇,而且规定检正官位在中书五房官之上,并要求精选有学识有能力的一流人才充任,这些意味着宰属的地位有明显提高。元丰改制后,中书检正官的职能为号称“都司”的尚书省左右司和新设的中书门下省检正官所取代,二者有权参与机要,因而往往得以干预当时的政事,在王安石变法期间起到了加强宰相推行政令的权力、促进新法实施的作用。文章指出,宋代宰属制度发展的趋势是宰属地位不断提高,权力不断增大,其中熙丰间检正、都司的相继设立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从此奠定了以后宰属制度的格局和基础。李师得出结论道,宰属制度的变化既是宋朝宰相权力增长的结果,同时又为相权的扩大提供了组织上的便利条件,二者互为因果,南宋不断出现权相,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宰属制度的变化也是原因之一^[8](第 68 页)。

从人物活动看政治变迁,是李师研究的一大特色。李师对宋元时的不少人物作过研究,如范仲淹、章

献刘皇后、寇准、曾布、王安石、李纲、杨么、岳飞、耶律楚材、郝经等等,除对范仲淹的研究是从全方位展开之外,其他多着眼于通过人物来考察政治变迁。其中如《论章献刘皇后擅政与寇准之死》^[9](第 307-314 页)与《从寇准的遭际看北宋前期君权与相权的矛盾》二文,堪称姊妹篇,主题都是以北宋名臣寇准为例,探讨宋代宰臣与女主、皇帝的关系及其对宋代政治的消极影响。李师指出,宋朝皇帝大权独揽,不许宰相有所作为,寇准这样的耿介忠直之臣屡遭猜忌,乍升乍降,只有像王旦那种谨小慎微之人才能久居相位,由此造成因循苟且、守旧无为的一代政风,宰执无从发挥辅佐作用,政府不能有效行使职权,终成积重难返之势^[10](第 359 页)。李师从人物活动入手研究政治制度,表现出独特的学术眼光,不仅别具新意,而且也使制度史的研究变得新鲜活泼,充满生机。

即便是对于范仲淹这样一个妇孺皆知的人物,李师的研究也有独特的创获,能见人所未见。

李师的范仲淹研究始于大学时代,在聂崇岐先生指导下进行,1947 年完成了题为《范仲淹传》的毕业论文。限于时间与篇幅,这篇论文只能对研究论题进行提纲挈领的阐述,成为日后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基础。20 世纪 70 年代末史学开始繁荣之时,李师重新拾起范仲淹课题,着手展开系统的研究。1983 年,李师主撰的《范仲淹》作为“历史小丛书”的一种,由中华书局出版;不久,《论范仲淹在御夏战争中的贡献》^[11](第 535-562 页)一文发表。1991 年初,中州古籍出版社正式出版了凝结李师多年心血的成果——《范仲淹传》。关于范仲淹的研究,并非一个新鲜论题,范氏其人更是早已家喻户晓。李师的过人之处就在于对这看似普通的选题,也能做出自己的新意。对于范仲淹在御夏战争中的活动及其评价,即是其中主要的创新之一。《范仲淹传》中有整整一章的篇幅铺陈这方面的观点。该章围绕“御夏战略的争论”展开讨论,对范仲淹的主守策与韩琦的主攻策,孰是孰非进行了详而不烦、全面深入的分析,指出:就宋夏双方军队的实力和地理形势来看,西夏利于速战速决,而宋朝不可能在军事上求得速胜,只能利用持久战,从经济上把夏国拖垮,然后迫使其就范,从而摈弃了那种对范仲淹主守是“区区过慎”^[12](第 82 页)的传统批评,得出评价说:范仲淹以防御为主的战略方针是冷静的,符合客观实际的方针,说明其具有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高瞻远瞩、通观全局的眼光,是个合格的帅才。宋朝在采取范氏主守战略后,实现了宋夏间的和局,对此应当怎样看待?今人常有微词,或曰仲淹居边,战绩平平,或曰增加岁币,得失参半,不足称道。李师不袭旧说,根据评价历史人物“不能脱离他所凭借的客观条件”^[13](第 109 页)这一原则,对仲淹御夏战争中的贡献进行了合乎实际的肯定。对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李师也有自己的研究视角。以往的研究多集中在对新政的背景、措施及失败原因的探讨上,李师则对范仲淹何以能够入居宰辅从而实施新政的问题进行挖掘。李师吸取了刘子健先生的观点,特别强调言官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又,程应镠先生主张写历史人物不能视为孤立的个人,而应写其与同时代人物的关系^[14](第 3 页),李师完全赞同这一原则,但在具体应用时又有自己的作法,即紧紧围绕着重要的政治事件写范仲淹的社会交往,诸如欧阳修、余靖、蔡襄等先后以言官奏罢宰相吕夷简、枢密使夏竦、参知政事王举正,将范仲淹推举到枢府,最终推举入中书,从而揭示出北宋中叶言官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同时也说明了范仲淹不是作为个人,而是代表整个庄田地主的改革群体来实践其政治主张的。在阐述新政的方案与实施过程时,李师的研究也与以往的不同,重在强调改革派对地方吏治的重视。像这类旧论题出新意,化平凡为神奇的创见,在《范仲淹传》中随处可见。

尽管李师以学术创新作为自己治学的出发点,但她并不刻意追求标新立异,而是主张求真、求实,有几分材料说几分话。惟其如此,李师的绝大多数论著才能经得住时间的考验,不断为后学开启前进之路。

李师的研究善于贯通比较,由此及彼,前后左右加以比较、考量,从而得出超越一时一事局限的科学结论;善于以小见大,从对具体问题的分析反映大场景的面貌,凡此种种,都是李师治学的特点。

由于各种原因,诸如工作性质的变动,政治运动的干扰,以及作为妻子、母亲须当兼顾家庭、子女,李师真正能全力投入学术研究的时间并不充裕,但李师能够坚持下来,并对学术发展作出富有创见的贡献,是殊为不易的。

三、教书育人

从 1954 年到武大执教,至 1989 年在武大离休,李涵师在历史教学的园地里辛勤耕耘了 35 年。在李师看来,教书育人、培养学生是比自己读书写作更为重要也更有价值的事业。

我们几个研究生,多数是从本科阶段就直接受教于李师的,直到今日仍有机会得到老师的耳提面命。20 年来,我们受老师多方教诲与指引,人生所得岂是区区一篇短文可以彰明的!这里只能就我们感受最深的略谈一二,真正是挂一漏万,聊表寸心而已。

我们感觉到,与其他老先生相比,李师培养学生的作法,有一些是大致相同的,但又明显地有着自己的特点,我们体会最深的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特别重视学生的志趣和悟性,采取多种方法开启悟性,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作用。

李师认为,从事史学研究,首先要耐得住清贫、寂寞,不受外界的纷呈诱惑。在她为大三学生开设的宋辽金元史专题课上,第一堂课就送给同学们两句话:“板凳宁坐十年冷,文章不教一字空。”李师招收研究生,不仅考查考生的业务,而且通过面试、交谈、向其他同学了解等方式,重点考察考生的动机和品质,对以考研作为择业“跳板”的不取,对通过读研为自己“贴金”的也不取,只关注那些有志于史学研究者。她说自己招收研究生的时间不多,不能无谓地浪费精力。她还自谦地说,自己记性不好,惟一长处就是有些悟性。悟性,也就是学术资质、学术前途,这是李师十分看重的一点,她认为,为人师者就应当善于发现与开启学生的悟性,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作用。在这方面,李师采用了不少独特的作法。

作法之一,让学生自我磨练,反对“手把手”、“抱着走”,授之以“渔”而非“鱼”。

李师认为,最好的教学方法是能够激发学生主动精神的方法,教学生不是教他们现成的结论,而是得出结论的过程,引导他们一起来实践这种过程。李师这种“Do It by Yourself”的主张,在指导我们写论文时表现得最为集中。在论文选题确定后,李师首先要求我们写出详细大纲,包括篇章布局、主要论点以及拟采用的史料,并对史料取舍的理由加以说明;大纲审阅通过后,开始动手写作文稿,其间可以向老师请教任何问题,但交稿只能是在我们自己认为已经完备之后。李师批阅文稿时,除了对少数错别字、标点符号顺手改正以外,很少直接替我们改作,而是做上記号,然后在面谈中把问题一一指出,让我们自己思考,提出修改方案。李师常说,科研能力只有在实践中才能提高,论文必须多写多练才能得心应手。她自己的论著就是反复锤炼,方公诸于世的。《范仲淹传》就是一个典型,该书的写作经过了长期的积累、磨练,从燕大时的毕业论文到 80 年代的单篇论文,从写作历史读物,到出版专门著作,前后经历数十年,用“数易其稿”远不能概括其艰辛、认真。李师要求学生也是这样,不仅每门学位课程都要写作课程论文,而且在入学的第二年必须完成一篇学年论文,作为毕业论文的准备。无论对研究生还是本科生,凡经李师指导的论文,每篇都要反复修改,不断完善,甚至不惜推倒重来。有的本科生毕业论文多次不能过关,学生当时不理解,难免感到委屈,甚至埋怨、焦急流泪,但日后回想起来十分感念,写信给李师说这段磨练不仅练了论文写作,也练了心性、作风,是人生难忘的一课。

作法之二,带领学生参加学术会议,外出参观考察,学习书本以外的知识,开阔眼界,增长阅历。

在校听名师讲课与外出参加学术会议,在培养学生科研能力上有着各自不可取代的重要作用。李师十分重视借用校内外的学术资源来提高教学质量,只要有机会,就要安排我们外出考察,参加高水平的学术会议,以此打破学校相对封闭的环境,使我们增长见识,丰富阅历,接受更宽泛的学术熏陶。

中国宋史研究会是全国第一个断代史学会,每两年召开一次全国性学术会议,在李师的带领下,我们 82 级研究生在 3 年的学习阶段,一次不拉地参加了其间两届宋史研讨会,先是入学当年的郑州会议,再是第三学年的杭州会议;86 级研究生则先后参加了赤峰辽金史年会和石家庄宋史会议,惹得周围的同学们羡慕不已。每次参加会议,李师都要求我们必须提交学术论文,参与学术讨论,正是在这些会议上,我们得以了解学术前沿,领略学界风采,聆听前辈指教,并与同辈学人建立起学术友谊。所有这些,对

于我们青年学子能尽快进入学术领域无疑有莫大的帮助。

但在当时,有的同学对参加全国性学术会议的意义认识得并不那么清楚。杭州会议期间,有两位研究生不听讨论私自出游西湖,李师知道后进行了严厉批评。李师并不是单纯反对游览河山,但她告诫我们,首先应当牢记参加学术会议的目的是什么,珍惜这难得的学习机会,也对自己的研究生形象负责。从那以后,这类事情再也没有发生过,而且,即使在多年以后,老师的这些教诲仍然犹如催征的号角,警醒在我们耳边。

为了让我们写作毕业论文能够掌握最新的研究动态、搜集尽可能丰富的资料,李师利用暑假亲自带领我们出外考察,北上北京、洛阳,南下南京、上海,每到一地,就带着我们熟悉当地的图书馆,查阅、复制在校内看不到的重要资料。炎炎烈日下,李师和我们一起在长途汽车上颠簸,在路边小店里用餐,而当时的李师,已是年逾花甲。先生如此不辞劳苦,只为让我们学生多一些收获。

第二个方面是强调创新、求实、严谨的学风,以自身的表率加以引导、教育,把学术规范的训练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

有关学术规范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了一场大讨论,自今方兴未艾,以至有“九十年代中国一大学案”之称。但在许多学界老前辈那里,做学问要讲究学术规范早已是其自觉遵守的准则,李师也不例外。例如,她写作《范仲淹传》,动笔之前就广泛搜罗同类研究有哪些重要的成果,尽可能找来成果原文原著,看前人解决了什么问题,是怎么解决的,解决的怎样,还有哪些问题没有解决,自己打算如何突破。不仅在国内广泛搜罗,海外、港台的也不放过。在80年代初期,资讯交流远不如今日便利,李师托亲朋好友设法四处搜寻,能找来读的都读了,之后才开始自己的写作。李师通过指导我们写作论文,从学术、道德、操作等多个层面训练我们的学术规范,并把这种训练当做一项基本训练。所谓学术层面的训练,是要求我们重视在学术领域进行调查研究,充分掌握学术研究的前史、现状和发展趋向,把论文的创见与学术价值放在首位;道德层面的训练,是告诫我们严守学术道德,凡是引用他人论著必须注明出处,若是参考、吸取他人观点,虽非原文引用,也要以“参考文献”形式说明,不得“贪他人之功为己有”;操作层面的训练,则是教会我们作注的方法、格式,以及引用史料必须反复核对原文。李师对我们文章中的引文,不时抽查,个别舛误尚允许校订改正,错误多了就退回去重新做过。如此反复训练,使我们习惯成为自然,但凡引用资料,不核对几遍是不放心出手的。

第三个方面是重视基础知识、基本训练。

李师教我们研治古史的基础知识分为四类:目录学、版本学等入门的工具,各种基本史籍、史料,中国史的基本构架,治史的基本理论与方法。

版本学、目录学、年代学等,是史学研究的基本工具,李师告诉我们,20世纪50年代邓广铭先生就把职官制度、历史地理、年代学和目录学形象地比喻为“四把钥匙”^[15](第120页),掌握这四把钥匙,才能具备研究历史的最基本技能,得其门而入。研究生阶段的第一个学期,李师就为我们安排了这方面的课程,她请图书馆系的老师为我们讲授古籍版本与目录的课程,并把我们带到校图书馆线装书库,请资深馆员现场指导。陈垣先生的《校勘学释例》、《二十二史劄记》等更是我们的必修课。

对基本史料、史籍的熟悉,对史料运用方法的掌握,也是研究生伊始的必修课。整整一个学年,李师为我们开设了“宋辽金元史料学”、“史籍阅读与指导”两门学位课程,史料学课程择要讲解宋辽金元基本史籍和考古发现,要求我们掌握这些基本史料的史源、内容、价值及使用中应当注意的问题;史籍阅读与指导课程则以自学为主,每周一次向老师汇报读书心得。李师要求我们前两年至少通读一部基本史籍,或《长编》,或《要录》,或《金史》,同时根据我们各自的研究方向选择阅读其他正史、政书,她还特别提醒我们注意宋金元文集、笔记对于研究宋金元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的价值,分析陈寅恪先生“以诗证史”的意义,指导我们结合史籍的阅读认真领会。为了让学生尽早掌握史料解读与分析的基本功,李师在为大三学生开设的专题课上就开始训练学生,让学生阅读原始资料,在课堂上断句、标点、翻译,并概括史料的内容,从学生中发现苗子,加以个别辅导、培养。史料的选择也是中学研究的一项基本功,李师认为,

史料的搜罗要尽可能广泛,对史料的鉴别、比勘、考证要尽可能充分,但史料的运用则应做合理、精当的取舍,不赞成材料的堆砌,主张精选有代表性的关键材料来说明问题,从而撰写出有创见、有新意而又言简意赅的论著。

在对学生进行治史的基本训练方面,除了前述学术规范的训练、史料搜集与分析的训练等等之外,李师还格外重视文笔、文风的训练,认为史笔是史才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史识、史德一样,不可或缺。李师喜欢语言简洁、文笔生动的论著,她自己的《范仲淹传》就在这方面作了成功的尝试。该书篇幅不大但内涵相当丰富,文笔十分精练,人物形象饱满感人。李师要求我们,文字必须反复锤炼,尽量简洁,能用两句话说清楚的问题绝不用三句话,一个多余的字都不要,我们的文稿从数十页精简到数页是常有的事。还有的同学原来爱用半文半白的语言,在李师的指导下也得到更新,大家都以文风朴实、简练为追求。

为了加深我们对学科知识的基本了解,提高我们的教学实践能力,李师为我们开设了专题课,她是主讲,我们每人也有一个专题的任务,自己找资料备课,与老师讨论讲稿,然后在课上和大家交流,在这个过程中得到锻炼和提高。李师还指导我们处理好广博与专深的关系,强调在纵横比较中把握宋辽金元的历史,为此,她以本系为依托,指定我们修习唐长孺、吴于廑、石泉等先生讲授的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世界通史导言、历史地理概论等课程,拓展知识的深度与广度。有的同学毕业后从事政治学或社会学的研究,成为该学科的学术骨干,追根溯源,还得益于研究生阶段的严格训练、宽厚基础。

为使学术薪火代有传人,老师为我们耗费了无穷心血。

李师对学生的影响,不仅是所教的知识,而且还有她的思想精神、行为方式。李师生性耿直,嫉恶如仇,为人坦诚,喜欢雪中送炭,不愿锦上添花,为此自己没有少吃亏,但也因此得到别人的信任,交了不少好朋友。她曾冒着风险为中学老师翟宗沛先生的政治冤案平反而奔走,使之终得昭雪;她曾在被打成“右派”家属的沈祖棻先生倍遭歧视之时登门探望,不计他人的议论,……她的正直、率真,她的反对趋炎附势、淡泊名利的人生态度,昭示着我们做对社会负责、于他人有益的人;她严谨自律的人格为我们的价值定位树立起一杆标尺;她对事业的执着则激励我们对学问的追求。老师对学生的影响既是潜移默化,又是昭彰可鉴的。

作为严师的李师,同时又像慈爱的母亲,把学生当做自己的子女,不仅在学业上,而且在思想上、工作上、生活上全面关心学生的成长。这方面的事例,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实难以文字概括。我们找工作,李师帮忙联系,大力推荐;我们走上教师岗位,李师教我们备课、板书直至讲台上的仪表;我们在婚恋、家庭上遇到麻烦,李师帮我们梳理、沟通;有同学病了,李师四处寻医问药,甚至亲自带学生上医院看医生;李师的家,对不少同学来说就是自己的家,他(她)们在这个家里自由自在地读书写作、饮食起居;对于那些有志于学但家庭贫困的青年学生,李师拿出自己有限的工资予以无偿资助,不在意他们是谁的学生,有时甚至不问他们的姓名,像这样的事情远不止一二次;……在学生身上,李师倾注了几乎全部的精力。

李师直接培养的研究生并不多,只有 82、86 级两届五人,但受教于李师的却不少,包括历史系的很多本科生,特别是直接在李师指导下写作毕业论文的本科生,如今,他(她)们当中有高校教师、科研人员、国家机关干部等等,不少人成为所在单位的骨干或领导,他(她)们在努力继承老师的治学与为人,诚所谓“后浪推前浪”。老师的人格力量、治学态度、学术精神,正在新一代身上得到延续和张扬。

参 考 文 献

- [1] 李 涵,等. 缪秋杰与民国盐务[M]. 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
- [2] 李 涵. 蒙古前期的断事官、必闾赤、中书省和燕京行省[A]. 元史论集[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 [3] 李 涵. 金初汉地枢密院试析[A]. 辽金史论集:第4辑[C].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
- [4] 唐长孺,李 涵. 金元之际汉地七万户[A]. 文史:第11辑[C]. 北京:中华书局,1981.
- [5] 李 涵. 也论郝经[A]. 元史论丛:第3辑[C]. 北京:中华书局,1985.

- [6] 李 涵, 沈学明. 略论奚族在辽代的发展 [A]. 宋辽金史论丛: 第 1 辑 [C].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 [7] 李 涵, 张星久. 金代奚族的演变 [J]. 武汉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1986(6).
- [8] 李 涵. 试论宋朝的检正与都司 [A]. 刘子健颂寿纪念宋史研究论集 [C]. 东京: 日本同朋社, 1989.
- [9] 李 涵. 论章献刘皇后擅政与寇准之死 [A]. 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 [C].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
- [10] 李 涵. 从寇准的遭际看北宋前期君权与相权的矛盾 [A]. 国际宋史研讨会论文集 [C]. 开封: 河南大学出版社, 1992.
- [11] 李 涵. 论范仲淹在御夏战争中的贡献 [A]. 宋史研究论文集: 第 2 辑 [C]. 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4.
- [12] 宋 魏 泰. 东轩笔录: 卷 7 [M]. 北京: 中华书局校点本, 1983.
- [13] 李 涵, 刘经华. 范仲淹传: 第三章 [M].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1.
- [14] 程应鏐. 范仲淹新传, 自序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
- [15] 刘浦江. 邓广铭与 20 世纪的宋代史学 [J]. 历史研究, 1999(5).

(责任编辑 吴友法 涂文迁)

Outstanding Historian & Model Teacher

— On Prof. LI Han's Researching and Teaching of History

YANG Guo¹, ZHANG Xing-jiu²

(1. School of Humanities,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2. School of Politics & Administration,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ies YANG Guo (1954-), female, Professor, Doctoral supervisor, School of Humanities,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history of Song Dynasty; ZHANG Xing-jiu (1956-), male, Professor, Doctoral supervisor, School of Politics & Administration,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history of Chinese political systems.

Abstract Professor LI Han, a famous historian, was a student of the most outstanding historians such as Chen Yin-que, Nie Chong-qi and Weng Du-jian. At the near half century of her study career, professor Li's been concentrating the knowledge, careful and creative, making a positive contribution to Song, Liao, Jin and Yuan study. Her representative works makes unique creativity, careful research and deep analysis, which are generally accepted as classics of study. Her research is good at comparisons in order to get scientific conclusions. It is also good at finding basic explanations from some concrete objects. Both of them show the clear special features. At the same time, professor Li takes teaching as more important business. She educates students not only basic knowledge of history study, but various methods to open their minds. Besides developing students' initiative, she particularly emphasizes the good style of study, the creative, realistic and careful style. With her own example to leading and education, professor Li takes the training of academic norms as the most importance issue.

Key words LI Han; Research; Teaching; Historian